

如何拯救： 莫言《酒国》拯救事件的文学建构

高志

摘要：“救救孩子”作为文学母题曾被反复书写。追溯莫言的创作谱系，该文学母题的书写具有共性和个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为社会或者启蒙主题。莫言《酒国》是一个独异的文本，它是文化、市场和社会的合力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征兆可由文本的微观和宏观隐喻显现；莫言从社会问题切入，链接问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层面，以审美现代性质疑经济现代化的病症，他从制度、引导者和批评的角度思考拯救孩子的可能性。莫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拯救路径，但不能简单地将《酒国》贴上隐喻批判的标签，他从人物设置、情节处理和叙述者声音视角等方面探索问题的解决；莫言在时代限制和书写的阈限中试图勾勒现代“救救孩子”的文学路线，从叙述多重声音、戏仿经典“拯救”模式、文体互文等角度突破“救救孩子”的原有模式进行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书写困境，凸显拯救书写的纵深性和复杂性，简单用“晦涩”和搁置评价的态度视之并不可取。

关键词：《酒国》 拯救事件 救救孩子 文化隐喻 敬仿

“救救孩子”主题是现代文学书写的命题，源自鲁迅《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风筝》《故乡》等篇章。鲁迅从五四启蒙的视角去思考儒教视阈下的孩子教育和成长问题，提出自我牺牲，保全下一代的新思想，“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①。莫言吸取鲁迅的思想养料，探索“救救孩子”主题书写深度。他在当代市场经济的视阈下，调用多种叙事资源，准确地表现“救救孩子”的现实和书写困境，并寻找到表达的突破口；莫言也不无自豪地说：“如果说新时期真有一个先锋派，那我就是第一先锋。”^② 本文从“吃孩子”现代谱系、制度和批评等社会层面、文学形式的解构层面入手梳理莫言书写的复杂性，试图勾勒莫言“救救孩子”思想发展脉络和表达的多层次性，莫言《酒国》可以说是这一主题“传达某种文化隐喻的集大成者。”^③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② 莫言：《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③ 吴义勤，王金胜：《“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从〈狂人日记〉到〈酒国〉》，《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收稿日期] 2019-03-26

[作者简介] 高志，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山东济南 250100

一、“吃孩子”的现代谱系：文化、市场、病症

“吃孩子”的现象古来有之。从易牙烹儿开始，“吃孩子”事件时有被文学作品记载，如明清神话小说《西游记》大量描写“吃婴孩事件”；现代书写从鲁迅起，以封建文化为批判对象，在现代启蒙的视角之下对吃人的现象进行审视。《狂人日记》首开“救救孩子”主题，鲁迅开了“救救孩子”现代小说的先河，《药》提到吃人问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涉及孩子的培育问题；新时期伊始，刘心武《班主任》涉及“文革”中被毒害的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从教育角度提出孩子的拯救问题，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审视大灾荒下的吃人事件，莫言《蛙》中吃婴儿胎盘的叙述，这些血淋淋的书写构建了一个文化奇观，这种文化是一种病态的、非人的丑陋嗜血文化，是反文明的。鲁迅提出要以儿童为本位，要立人，“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①。

莫言认为《酒国》是他创作的“迄今为止最完美的长篇”^②，它的写作受到鲁迅的影响，“小孩被打死的情节，与读鲁迅有关系。《药》与《狂人日记》对《酒国》有影响。”“这部作品里有戏仿，有敬仿，比如对《药》的敬仿。……我的本意并不是去说中国有食人现象，而是一种象征……作品中对肉孩和婴儿筵席的描写是继承了先贤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③莫言写作该小说的意旨，可以借镜小说中李一斗创作《肉孩》的话来蠡测，是“对当前流行于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的一种挑战，是用文学唤起民众的一次实践。我意在激烈抨击我们酒国那些满腹板油的贪官污吏，这篇小说无疑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是一篇新时期的《狂人日记》”^④。

《酒国》采用侦探小说的程式。侦查员丁钩儿调查吃婴孩事件，对这一延续至今违背文明的人伦问题，丁钩儿紧张、兴奋、忐忑不安，这一大众心理源于吃人文化的源远流长，更来自吃人事件的隐蔽性，以及敌对势力团体的庞大且复杂。丁钩儿不断地揣摩吃婴孩魔王的凶狠与残暴，然而当遇见他们——富有风韵的女司机、美女服务员、客气热情的党委书记、矿长时，发现他们并不像人们日常建构的坏人形象那般丑陋、凶狠和暴虐，他们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莫言解构了十七年文学中非工农兵形象的丑陋、狡猾和凶残，他把小说的书写放到了与生活平等的地位，小说中的人物、环境和细节更加细腻、真实和切近事物的应在性，小说的可读性、可信性增强；小说整体的虚构建立在细节的真实上，建立在整个文化隐喻的基座上，增强了小说的讽喻功能，易引起读者共鸣。“恩格斯所说的‘细节的真实’，实际上就是生活的真实，就是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人物、事件、环境、景物等都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如果做不到这样……就是通常说的缺乏和失去了生活的真实，读者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就不能或不太信服了。”^⑤莫言选择了五四文学中的“吃人”主题进行现时代的书写，这种移植不仅仅是对启蒙精神的呼应，还是对历史文化中反文明退化思想的否定，更是小说对资本市场中反人性、反生命的丑恶面的揭露和痛斥。他借镜历史，以启蒙为武器，质疑和反思资本市场本土化过程中的反人类性。莫言没有给出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以丁钩儿的悲惨、荒唐而又具宿命论（丁钩儿谐音“脬沟儿”即河北、山东一带土语“排泄器官”的代名词，“脬沟儿”本是污秽物的准出机关，它与污秽物同流合污，它不会排斥污秽物，否则“脬沟儿”本体就解构了，这隐喻丁钩儿的结局，最终以落入厕所而死，即是应得之所）的结局昭示了解决“吃人”问题既要注意文化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② 张清华，曹霞：《看莫言朋友、专家、同行眼中的诺奖得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

③ 姜异新：《莫言孙郁对话录》，《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0期。

④ 莫言：《莫言文集》（第3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53-54页。

⑤ 端木国贞：《试论恩格斯的典型学说——从〈创业史〉谈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第66页。

因素，也要考虑经济因素，全盘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会忽视资本市场盲目性、非理性的缺陷；启蒙与市场相伴而生，人的解放为市场提供了自由充足的劳动力，但资本市场反过来压抑人性（莫言更进一步地把市场吞噬生命血淋淋展示出来，这种书写更加直接地把资本市场与个人生命本体的悖逆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逻辑昭示启蒙最终的恶果是葬送了启蒙，启蒙走向了反启蒙，解放生命走向了摧毁生命，现代性走向了反现代性。

莫言对人物名姓的设置、行动元的安排，客观上消解了丁钩儿作为检察官的职业功能。当他面对精致的“麒麟送子”时被震惊了，其良知在视觉和回忆历史中被加强，他回忆吃人事件的鼻祖：易牙烹儿献给齐桓公。丁钩儿把市场交换价值规则下的“吃孩子事件”看作无法容忍之事；作者用了12个“啼哭”、2个“哭”、3个“哭声”、2个“嚎哭”表现丁钩儿内心剧烈的变化，终于以开枪来完成所有这些情绪的积蓄。丁钩儿的犹豫和拖沓，从侧面反映了他对市场文化有认同的一面，文化“是由语言、想象世界以及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的价值和规范，以一个独特的方式促成和制约的”^①。欲望和理智，职业和人性，良知和堕落形成了一个矛盾体，这一矛盾控制其选择，最终以他射穿红烧婴儿的头作为结局。这是一个寓言，丁钩儿虽然没有加入吃人者行列，但是他的延宕行为客观上帮助吃人者去吃人，他的行动和结果背离，主观与客观逆反。开始他认为“麒麟送子”是一道用各种瓜果蔬菜和肉类做成的菜，与“孩肉”无涉，后来他又在金刚钻的提醒下，认识到自己也吃了婴孩餐，在虚虚实实中被戏弄了一番。

作者充分发挥了写作的文化批判功能。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市场交换价值侵入社会的层层面面，家庭伦理遭到冲击，市场对自由劳动力的要求拆解着传统家庭、社会结构，配套的社会治理体制又没有马上跟进，出现了错位。在此背景下，文学离开形式主义实验的高蹈，开始关注日常琐碎生活和进入消费社会的囚笼（先锋文学、现代派文学、新写实文学、美女作家写作浪潮等，它们不是追逐形式技巧，玩弄语词游戏，就是主张“写作的零度”^②，关注社会的热情消逝了，对国民性的批判退出了作家的视野），莫言逆流而上，“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肉孩》的小说……运用了鲁迅笔法，把手中的一支笔，变成了一柄锋利的牛儿尖刀，剥去了华丽的精神文明之皮，露出了残酷的道德野蛮内核。”^③

《肉孩》开篇写道：“秋天的后半夜，月亮已经出来，挂在西半天上，半块，边缘模糊，好像一块融化了半边的圆冰”^④。而鲁迅《药》的开篇，“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⑤两相对比，可看出莫言仿写、呼应了《药》；在小说《药》中，华老栓为治疗小栓的肺病去买沾满革命犯人的血的馒头。鲁迅从启蒙的视角来审视辛亥革命缺乏群众性基础的问题，五四科学民主的思想普及面较小，并且革命是以拯救民众于水火为旨归的，而民众却并不理解，反而以革命者鲜血来治病，这一悖论表现了鲁迅批判的深刻性。在《狂人日记》末尾，鲁迅引出“救救孩子”的主旨，同时也看到了革命者宣传革命的无效与民众的愚昧和无知；小栓（懂事的孩子）的肺病需要救治，但救治的方法是医学，夏瑜革命者们的被救治需要革命理论的普及，需要韧性的战斗，而革命需要策略，拯救孩子同样需要策略和韧性的斗争。

在《红高粱家族》中，江小脚使用劝、捧、拉、威吓的策略对土匪余占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①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5页。

② 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③④ 莫言：《莫言文集》（第3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44页，第48页。

⑤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3页。

旨在争夺战争武器，这种叙事被很多研究者命名为“新历史主义”^①（旨在改写十七年革命史并获得文学史地位）；类似的典型例子如赵树理《锻炼锻炼》，陈小四设计谎说让大家来拾花却临场改变计划，把经常称病偷懒的村民惩治了一番，这种策略性的行为在十七年中遭到批判，实质上赵树理真实地书写了现实情况，反映了农业合作化中的问题；如果还原到历史现场，党员陈小四策略虽不光明，但也反映了革命、建设中需要策略的情势，他不可能超越历史而以规范化管理来进行生产，所以从现代化视角来审视陈小四的行为是有失公允的，“领导们不是对群众做说服动员，激发其爱社如家的积极性，不是针对农业社以往纪律存在的漏洞，完善制度机制，实现规范化管理，而是故意制造机会，借助百姓的人性弱点给予惩罚。这种工作方式暴露了年轻领导干部对待群众的冷漠，对普通百姓的自私给予扩大化的斗争，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②。

在莫言《红高粱家族》中，江小脚的行为具有类似的性质。1985年，“人的文学”得到重新发现，十七年革命文学书写方式遭到颠覆，人物塑造开始摒弃“三突出”、“中心任务论”等书写模式，探索更加人性化、民间化和现代化的写作模式。江小脚、陈小四的塑造还原了人物的现实处境和处理困境的策略，虽然不符合“高大上”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方法，但此种写作模式是落地的，也是韧性斗争所需要探索的方式，“正无需乎震撼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③。由此反观夏瑜们，革命的不在地性和生硬性不仅不能拯救受难的孩子，反而会葬送自己的性命。

《肉孩》中，莫言着眼的是金元宝洗孩、送孩、卖孩的全过程，孩子在父母眼中是有价值的商品，他的质量和等级是以标准化和金钱来衡量的。虽然母亲略有不舍，母性的光芒不时闪现，但男性的决绝和冷漠折射出这种交易的频繁和普及性。金元宝们在意的是自己孩子的等级，以此作为自豪的资本，这一现象折射了社会的价值观中非人性原则和残酷的本质。叙述的质朴和细节的真实性，抛弃了魔幻的特色，但文本整体上仍是一则寓言，不管是一部分社会观念的寓言：金钱作为衡量生命的准率，还是对“吃人”的酒国的讽刺和抨击，莫言反思了市场对人性、生命的吞噬，物质的冰冷、情感的淡漠并不仅仅要求我们救孩子，还要拯救成人/大孩子。

二、拯救如何可能：制度、引导者、批评

“救救孩子”在鲁迅《狂人日记》中是一句呼唤，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则建议父亲们要有担当精神。莫言通过象征化手法延续了鲁迅“救救孩子”的主题。细节上，他使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婴孩大餐，旨在唤醒良知，婴孩的天真可爱与资本世界的狡诈虚伪，亲情与无情，生命与食物构成了相异的语义世界，这种生命被现实割裂、蹂躏和摧残使读者重新思索资本世界中的人伦关系。婴孩大餐与文中的卖肉孩的过程形成连续性，小说《肉孩》和《酒国》书写的婴孩大餐构成了一根链条的上下级关系。现实和虚构或者虚构和虚构相对照，小说和现实的那种模糊不清状态，隐含了作者的写作隐衷和对这些现象的看法。莫言以形象质感的语言把大餐中婴孩的憨态、天真、可爱写了出来，那种固定的状态与无生命的机体形成截然两分的对比。丁钩儿体验过哺育孩子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场景，这些使丁钩儿更加同情婴孩，他的拯救意愿更加强烈；莫言的书写更加贴近人性，他揣摩人物经历和社会背景来引领读者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且通过细节增强小说的感染力，并激发读者对婴孩大餐的愤怒和痛恨，使读者更加认同和响应拯救孩子的主题，而不是沉浸在小说的奇

^① 邱运华：《静默的旋律：学术史与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4页。

^② 曹书文：《人的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双重失落——重读赵树理〈锻炼锻炼〉》，《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1页。

幻描述和猎奇的追逐中。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比较了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区别，以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以孩子为本位，改变以长辈为本位的传统模式，父亲们应该讲付出而不讲回报，为后代创造自由发展的环境，“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①。

莫言在《酒国》中探索如何拯救孩子的问题，他以文学形式研究三条拯救路径的可行性：第一，剥出婴孩制作艺术的合法性；第二，颠覆革命文学中引导人角色的主导效用；第三，知识分子、批评者职责问题。莫言“拯救孩子”关注到语言、话语、制度层面，这不仅是对“文革”借助毛话语的反拨，也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项制度规范的呼唤，提出不能有效执法的文化、社会背景问题，并对各种超越伦理道德、破坏文明的“吃”的现象进行了强烈抨击。

小说《酒国》中详细描述了“龙凤呈祥”的制作流程，总而言之，是化丑为美。酒国婴孩的制作也变成一种艺术，从生产、储存到制作着眼于科学化、标准化，烹饪学校更把婴孩餐视为一种艺术品。这一系统工程使“吃人”变得艺术化、审美化，甚至逐渐走向合法化。“我们吃的不是人，我们吃的是一种经过特殊手艺制成的美食……他首先特别明确地强调，厨师是铁打的心肠，不允许滥用感情。我们即将宰杀、烹制的婴儿其实并不是人，它们仅仅是一些根据严格的、两相情愿的合同，为满足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② 金刚钻以国家领导人、艺术家、社会名流等都吃过这道大餐来压制和诱导丁钩儿就范，使其加入吃人的行列；并以“阶级弟兄”为之归类，这些“吃人者”凭借革命语言的话语权建构起一套合法的语言修辞系统，语言为他们做事敞开了合法的怀抱。总之，金刚钻们借助酒模糊现实和虚幻的界限，以审美为载体把非法的食物人为提升为艺术。通过掌控主流话语权，运用语言把非法事件变成合法活动，这是“吃人者”把非法的“麒麟送子”变成合法的一套严密的系统工程。通过艺术和科学带来事物、事件的伦理关系、文化关系和合理性的改变。

监控、侦查人员会被一套系统的陷阱捕获：酒、肉、色，这些基本的生理需求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以此为人生目的，则是动物行为的表征，“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正常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唯一的经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③。当然，这一系列的诱惑皆是人无法抵御的，作者在这里对人为执法的随意性、不可控性进行了批评，这种没有制度和科学规范的传统执法模式并不能拯救“孩子”。从制度层面上，莫言探索了其有限性和无效性。金刚钻对丁钩儿说：“你闯入私人住宅，强奸我的妻子，证据确凿……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④ 这从反面证明了科学执法的必要性。随意性、不受监控性不能保证拯救孩子的成功，作者在这里强调了拯救孩子要走法律程序，要制度化、程序化、组织化。

拯救孩子还涉及拯救主体的意志性、勇敢和智慧性问题，涉及精神的指导问题，所以莫言在此设定了一个精神引导者的角色。这在以往的革命小说中有类似人物结构，如《红旗谱》中的贾湘农，《三里湾》中的老杨同志，《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等。西方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引导者的影子，典型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页。

②④ 莫言：《莫言文集》（第3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71-172页，第134-135页。

③ 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的如《高老头》中的伏脱冷，这一人物设置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小说中，丁钩儿调查酒国婴儿案，在金刚钻酒、菜、色的陷阱下沦陷了。丁钩儿没能挺过肉体的欲望，调查的任务延宕，他处于理智和犯罪的纠缠中，任务的严肃性受到敌方的嘲笑和褻渎，丁钩儿迫切希望寻找到前进的力量和方向。丘八爷就是丁钩儿寻找的父亲的形象，丘八爷这位老革命就是“父亲”的代言人。丁钩儿正义的调查行动，沦陷，寻找“光明”的指引者“父亲”，这种框架模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类似。十七年文学建构革命文学史，树立了英雄主义的“父亲式”文学，“文革”时期达到极致，文学的母性、落地性、人性特征被压制。新时期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派文学、现代派文学等开始改写文学观念、模式，虽然十七年模式仍然潜在于小说中，但父亲的地位受到冲击、颠覆。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开始寻找父亲，这种文学谱系被莫言变形在《酒国》框架中。

丁钩儿寻找父亲，拯救自己，旨归在拯救“孩子”，而老革命却对丁钩儿的能力提出了质疑，“瞧你那点出息……我们播下虎狼种，收获了一群鼻涕虫”^①。莫言笔下的丁钩儿被还原为普通人，而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我们不是站在‘红色经典’的基础上粉饰历史，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②。在老革命的言语激励和鼓动下，丁钩儿的良知被唤醒，但是他仍然纠缠在与女司机、余一尺的情感三角中不能自拔，最终坠入厕所而亡。丁钩儿的结局改写了革命小说中英雄人物的发展方向，“我觉得苏联的小说比我们的红色经典要好一些，好在真实。它们暴露了革命队伍内部的黑暗面……”^③英雄人物有了缺点，英雄人物作为个体难逃时代和文化囚牢。莫言在开篇同情和原谅了丁钩儿的堕落。余华曾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④无论丁钩儿怎么辩解、挣扎、抗争，也不能逃脱被大染缸同化的命运，莫言再次强调了拯救孩子的艰巨性、复杂性。

莫言从批评家角度来讲拯救孩子的问题，批评家应该发挥其批评的职责，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吃”的恶行，揭露社会黑暗，不应文饰是非（莫言《天堂蒜苔之歌》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奇观的文化当然会产生自己的意识形态”^⑤。莫言借助地主刘文彩的形象对腐败的特权阶层进行抨击，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些权势者，对等级现状进行了批判和对一般民众生存困境进行了关怀，并对批评界的沉默极为不满，这是文本中的副线索。对婴孩大餐之作的精湛技艺的书写，是作为暗线来以小说、书信等虚构的形式呈现。《酒国》的主线索对丁钩儿调查的艰难性进行了书写，这一主一次，一明一暗，凸显了莫言写作的策略性和时代难以言说的困境，借助革命话语、革命人物委婉地抨击酒国“吃人”现象及其主流话语体系，作者文人情怀及处事方式的策略性、艰难性粲然可观。

三、文学拯救路线图：解构的幽灵

《酒国》分两条线来叙述，主线是丁钩儿的侦查过程，副线是莫言和李一斗的通信以及莫言亲临酒国，两条线索交叉补充前进，丁钩儿的每一个行程都有副线补充、逆反和解构。第一章中主线为调

① 莫言：《莫言文集》（第3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② 林建法：《说莫言》（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1页。

③ 姜异新：《莫言孙郁对话录》，《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0期。

④ 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卷），外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91页。

⑤ 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查酒国的吃婴孩事件，丁钩儿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副线交代了李一斗和莫言的情况以及对酒与写作的看法，这与鲁迅《魏晋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有互文关系，而莫言直接嵌入当代。《酒国》里介绍了酒国大学、酒与生命的关系、酒与灾荒时代的生活，副线却揭示了酒国吃喝现象存在并且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酒国大学、猿酒、酒博士，每一条信息都指向酒国吃喝猖獗的腐败现象。

第二、三章主线交代了丁钩儿受到矿长等人招待，酒宴的景致和解酒技术精湛印证了第一章的副线，同时也是对第一章主线的解构。本章酒宴中的“麒麟送子”被认为是蔬菜水果做成的精品，否定了婴儿大餐存在的真实性；而第二章副线却交代了“绿意重叠”的制作和酒国“吃孩子”真实存在，《肉孩》《神童》以小说的形式书写了“肉孩”的交易流程和神童自我拯救的组织过程，这是对主线的颠覆和解构。

“妖孩”模仿革命文学语言和科学启蒙来取得被卖孩子们的领导权，为被卖孩子们建构了“父亲”的形象，“我给你们寻找光明”、“不是妈妈，不是姑姑，那是一个球，是一个天体，围绕着我们团团旋转，它的名字叫月球！”、“为我们带来光明的是电”、“同志们”、“斗争”、“光明”、“老虎”、“砸”、“爹”等关键词，把吃人者建构成“红眼睛绿指甲，嘴里镶着金牙”的妖魔形象，这是革命文学中对地主、反动阶级丑化策略的借用，莫言以此建构了这样一个革命、启蒙的事件，这些无父的孩子在“妖孩”的语词、行动和痛说家史的感召下组成了一个地下的反抗团体。

“妖孩”带领群孩杀害了监管男子，其残暴举动源自自身悲惨的历史。小妖精以暴制暴的行为和思想与酒国关系密切，孩童交易抹杀了亲情、爱情、友情，无爱的孩童以无爱来对待无情的社会。“莫言、阎连科、余华共同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物质的强烈刺激下，人已变成另一种生物。这种生物乃是欲望的动物，金钱的动物。”^① 酒国的腐败和市场的交换规则无孔不入，“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妖孩”作为启蒙主体，启蒙内容包括革命现代性、封建伦理专制思想和通俗科学知识，这些资源来源较为复杂：传统文化、五四科学启蒙、革命思想，一言以蔽之，它们以点带面的统括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大部分。这些思想有的相互抵触，如“父为子纲”与启蒙思想，因此“妖孩”借用这些庞杂的思想资源不可能完成逃离的任务，这也可以隐喻中国自晚清以来各种思想被借鉴救国失败的现实。酒国/救国谐音，“妖孩”等出逃事件的失败昭示救国（酒国）/拯救孩子的困难。莫言“以小说套小说”的双线形式重申拯救孩子的困难，并解构历史思想资源在当代场域中的有效性，“反抗者的消解和没落，既可以视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某种镜像式写实，更可以看作中国当代启蒙精英叙事困境的隐喻式表达”^③。莫言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难题的思想和方法，但他抛出的问题和探索的努力不应该被遗忘，作家的担当应该被肯定，“我立志要像当年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一样弃酒从文，用文学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国民性。”^④ 本节以丁钩儿所见为主线，驴食、蟋蟀以及特种粮食栽培中心的鸡米花，这些吃食与副线中对“驴街”的描述形成互补关系，合力为酒国“吃婴孩事件”的出水埋下伏笔。

第五、六、七章主线：丁钩儿堕入情网的陷阱以及调查受阻，副线以《一尺英豪》《烹饪课》《采燕》对酒国吃住特色尤其是“婴孩餐”制作过程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叙述，主、副线相互佐证了酒国“吃婴事件”。

① 刘再复：《“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酒国〉〈受活〉〈兄弟〉三部小说的批判指向》，《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②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9页。

③ 吴义勤，王金胜：《“吃人”叙事的历史变形记——从〈狂人日记〉到〈酒国〉》，《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

④ 莫言：《莫言文集》（第3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第八、九章，副线、主线颠倒位置，这一设置赋予主、副线不同的意义。副线中李一斗和莫言的通信以及小说中叙述的酒国浮出地表，酒国“吃婴事实”以小说形式而获得真实身份，《猿酒》《酒国》考查了酒的历史和叙述李一斗的岳父岳母故事来建构“酒国文化”的传承和坚固性，吃喝文化根深蒂固。丁钩儿无法摆脱它的纠缠，生命欲望引导他最终走向预定的归宿，折射出作者解构现实社会的意图。

第十章：作为副线的莫言以主人公身份现身，开始以黑粗体出现在文本中直接叙述。他开始踏上酒国的路程，前置的侦查员斗侏儒、采燕、猿酒、红烧婴儿、偷情等事件和情节都作为背景存在，他的视角替代了丁钩儿视角和李一斗的通信叙述样式。丁钩儿世界中“吃孩子”事件以虚的形式存在，他始终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婴孩做的餐，只是在旁听侧闻，想象虚构，从当事人的语言迎拒躲闪中以职业敏感嗅出吃人者的现实。莫言以第一人称介入事件，与真实更近了一步，但他仍是小说一虚构文学样式中的叙述者，真实和虚构交织，最终把小说的批判性发挥到极致。

真实地点出现：北京、天安门广场，并与酒国形成对照，莫言对这一细节的处置旨在营造一个真实世界，以纪录片形式把行踪介绍清楚，以期给读者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并不断地把丁钩儿故事拉进这个世界进行重构。莫言在此解构了丁钩儿故事的真实性，明确暴露其故事的虚构性，“莫言到了酒国，立刻把李一斗和莫言两个人营造的小说瓦解了”^①。同时也颠覆了酒国进行婴孩交易的真实性，在文本进行到过半时，莫言的出现是对小说真实性的翻盘，《酒国》前九章中丁钩儿探案、陷落、想象等经历瞬间变成了虚构，“我已经无法把丁钩儿的故事写下去，因此，我来到酒国，寻找灵感，为我的特级侦察员寻找一个比掉进厕所里溅死好一点的结局”^②。

莫言、李一斗等到达酒国，曾经存在于丁钩儿虚幻世界中的金刚钻部长、余一尺、一尺酒店、绿蚁重叠，以现实存在出现在莫言、李一斗的酒国世界。莫言对小马的欲望，莫言欣赏杀驴场景，市政府人员陪喝细节，一系列的情节与丁钩儿的经历构成对照结构。丁钩儿调查过程中长满了细节的枝叶，并以魔幻色彩结构故事，而在第十章，莫言解构了故事的真实性，从其写作策略可以看出莫言写作的拘谨和艰难，但字里行间仍然显现腐败和市场出现的乱象，资本侵蚀着良知、道德、情爱，甚至直接危害到孩童的生命。在刘心武《班主任》中，控诉了文革教育对孩子的身心戕害，莫言在《酒国》中直接控诉了腐败和资本市场对孩子生命的摧残；丁钩儿的惨败，揭示了资本渗透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组织中、动一发扯全身的现实。个体的清醒和反抗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局面，甚至个人最终只会沦落入吃人队伍中，这个“铁屋子”是万难破坏的，甚至清醒者也会被铁屋子禁锢住；20世纪90年代，市场交换准则被推展到各个层面，人文精神衰落，莫言从市场对个人生命甚至于人类未来的角度思考，批判之深，抨击之厉可想而知。

丁钩儿终因无法摆脱“吃”的欲望，落入厕所而死。这一精心设置的人物称谓、主题意旨、故事结局汲取了鲁迅的写作模式，小说中不断出现与鲁迅小说的互文，如《狂人日记》的主题“救救孩子”、《药》的仿写者《肉孩》《魏晋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与李一斗博士论文中酒的影响问题研究等，莫言凭借互文修辞向鲁迅的作品致敬，同时也继承了鲁迅的批判思想。不同的是，莫言运用了解构的策略，“解构——到目前为止一直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并不是坚持鼓吹多样性本身，而是强调异质性、差异、分离，这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是绝对必要的……一旦你把特权赋予了聚集，而不是离散，你就没有给他者、给他者的强烈的‘他性’和特殊性留下任何空间”^③。

① 莫言：《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90页。

② 莫言：《莫言文集》（第3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③ 雅克·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杜小真、胡继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49页。

小说中出现了三个叙述层次：一是以丁钩儿为主线的小说，二是莫言为叙述主体解构丁钩儿故事，三是《酒国》文本层次。第二层次中的莫言颠覆了第一层次中丁钩儿及其故事的真实性，丁钩儿侦探酒国“吃婴事件”皆为虚构，第三层次是莫言著的《酒国》，是小说，虚构文体，又对第二层次中莫言的颠覆进行了颠覆，被否定的酒国、丁钩儿、“烹婴学校”和“吃婴事件”的真实性遭到颠覆，莫言在“否定之否定”^①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叙述策略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然，莫言对社会的“吃人”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吃”的欲望能改变命运，“吃”又能使人、社会、国家堕落，“吃”成了改变地方官员命运、发展地方经济和地域文化的推动力。莫言经常说对一碗饺子的向往成就了他的写作事业。而在此，莫言却从社会、民族存在与发展上反思了“吃”文化及其产业的畸形发展，这是对当前“吃”资源、“吃”自然环境、“吃”健康隐形的批判，“文学家莫言超前地看到了一个经济主义时代来临的巨大隐患，即放纵物欲追逐带来的社会全面腐败”^②。

从宏观层面来审视，莫言《酒国》是对社会腐败和资本市场恶的方面的强烈批判，《酒国》“吃婴孩”虽然是一个宏大象征的隐喻，但莫言抛出的问题值得重视，“人性灭绝到如此程度，恐怕不是‘现实’中的实有情节，但为了金钱而榨取童工的廉价劳力和造成孩子心灵方向的迷失倒确实是工业文明发展曾有的产物”^③。莫言从审美现代性的维度，质疑和反思社会现代性问题，并且从叙述层面探寻社会敏感问题的文学干预路径，因此，《酒国》呈现出复杂的美学倾向，也彰显了莫言探索孩子成长问题的难度和困境。

（责任编辑：李兆芹）

① 邓晓芒：《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02页。

② 毕光明：《“酒国”故事及文本世界的互涉——莫言〈酒国〉重读》，《文艺争鸣》2013年第6期。

③ 刘再复：《“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酒国〉〈受活〉〈兄弟〉三部小说的批判指向》，《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